

国学丛书

罗尔纲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困学丛书

罗尔纲 著

上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困学丛书上、下册

罗尔纲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32 印张 插页 4 789 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219-01098-2/K·49 定价: 20.50 元

困学丛书

罗尔纲 著

下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困学丛书》钟序

一九八八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罗尔纲老师的《困学丛书》决定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向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献礼，这是喜上加喜的大事。

罗老的《困学丛书》收入专著十种，内容十分丰富。有象《天地会文献录》、《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等重要史料的提供；有《太平天国史考信录》、《八法对笔迹的鉴定》和《文史稽考集》等内容广泛的文史问题的考释；有《李秀成传》、《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太平天国的游击性运动战》等重大历史问题和人物的论述；还有《治学篇》、《记序文存》等讲述了读书和做学问的甘苦和经验。这部集子，包含了罗老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年的部分重要成果，也凝聚着罗老毕生治学的宝贵经验。数十年来，罗老编了约三千万字的太平天国和其它方面的文献和资料，写了几十部著作。这部《困学丛书》，和他的《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等，同是内容充实，论述精辟的宏篇巨著。

这部集子，为什么取名《困学丛书》？罗老在《自序》中谦虚地告诉读者：“因为一生治学，都是从不知，经过困难，奋力学习以求知的”，也就是古人说的“困而知之”的道理。罗老学识渊博，科学研究的功力极为深厚，却经常说自己是个“一无所知”，“在崎岖的道路上困学过来的人”。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他总是从基础做起，如履如临，精益求精，即许在取得重大成果以后，也没有感到轻松，更不敢有半点自满。这种精神，正是他能在文史研究中取得大丰收，在学术领域里做出大贡献的重要原因。

拜读《困学丛书》，深感全书十种，字里行间，处处体现了罗老治学的严肃态度、严谨学风、严密方法和严格要求。学术研究是十分严肃的工作，史学研究更是如此。罗老热爱祖国的历史，并以严肃的态度与高度的责任心，艰苦不懈地进行研究。不盲目依赖外国、崇信外人。他反对“为历史而历史”，指出所谓“撰写‘纯客观的历史’”，“只是欺人自欺之谈”。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历史研究，“必须要紧记着是为人民服务，一论一述，都必须向人民负责，都必须为后代负责”。这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也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可贵的见解和崇高的信念，罗老说是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得来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民史学家奋发自励、不断追求进步，真诚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

因为在主观上时刻把学术研究和为人民服务、对后代负责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罗老的治学非常严谨，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有时真有点过于苛刻的地步。这种事例，举不胜举。一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太平天国史》，是积四十年时间、功力写成的。向出版社交稿之日，依旧是“感到改之不尽，难对读者，心情无限沉重”。对太平天国军师负责制政体的探索，差不多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并非顿悟”。笺注《忠王李秀成自述》，从青春到白首，几经修订补充，前后历时四十九年。为了证实《忠王李秀成自述》并非赝品，罗老一面深思苦索，一面虚心向书法界的行家里手请教，最后摸索到采用书家“八法对笔迹鉴定”的方法，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太平天国天历的干支、礼拜较夏历提早一日始于何时与为何提早的问题，也是经过四十多年的艰苦探索、讨论，最后得到正确解答的。为了剔除旧史书体裁的封建性，体现新中国史学著作的时代精神，更好地说明历史而又方便读者，罗老在二十七年中把《太平天国史稿》进行了三次改写，终于形成了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的综合体。前面谈到的《太平天国史》，就是这种新体

裁的重要著作。即许在考究某些比较具体或细微的问题时，罗老也是本着“艰苦追求”、一丝不苟的精神予以对待的。他根据二十一种地方志书，结合其它资料，考定霍乱病是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从东南沿海传入我国的。两篇不满千字的《诺已考》和《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张冠李戴订正》的写作原由，是因为三十年代在贵县中学教语文课时，发现有疑问，为了对学生和学术负责，罗老以“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进行认真严肃的探索，结果纠正了当时中学语文课本长期存在的标点错误，考出了李清照把王涯误作王播，从而订正了延续八百多年著名词家的错误。至于在史料的发掘整理方面，罗老采用的把图书馆图书逐架摸底，然后对资料进行考辨，说明史料的来历，指出它的真伪，考究它的使用价值的方法，为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给国内外的史学研究者以极大的帮助，这已是有口皆碑的事，我就不多说了。

对于学术问题，罗老讲过：他从来不敢“客气用事”。无论是《困学丛书》，或是罗老的其它著作，都体现他的辨伪存真，追求真理，崇信事实的学术思想。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罗老的许多重大学术成就，有不少是在和不同的意见反复进行辩论，或不断修正自己过去欠妥的认识中得来的。罗老认为对的，他坚持，从不碍于情面而放弃原则，敷衍妥协。他对人家的错误意见“不客气”，对自己的错误意见也“不客气”。罗老关于李秀成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一九六四年秋，因为考证李秀成学姜维伪降钟会的故智，劝曾国藩为帝，并非叛徒。结果遭到一场“莫须有”的大批判。到了“文革”期间，大批判火上加油，罗老被迫写“检讨”。但是，无论是一九六四年，还是“文革”十年，虽然所写的“检讨”文字高可盈尺，但他始终只检查自己受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毒害，而没有认为自己对李秀成伪降的考证错了。谁都知道，在当时的情势下，能够这样做是很不简单的事。说明一个真正的学问家有原则，有根据的自信心是

非常重要的。坚信真理在自己手中，就可以无私无畏。正如罗老所说：“在学术研究上，敢于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有时就不免触人之怒，犯人之忌”。但是，“真理如果在自己手中，虽千万人反对也要勇往直前”。这也是正确地实行“百家争鸣”，发展科学文化所不可少的。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维教授在“大批判”当中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曾家口碑，和她于1977年扶病挣扎写给罗老的亲笔信，现在已经披露与世，真相大白，完全证实了李秀成确属伪降的结论，罗老这种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和严谨学风。

另一方面，我们从罗老的著作中又可以看到，对于学术问题，他从不“意气用事”。他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既能坚持真理，又能服从真理。在罗老看来，学术研究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史学工作者，如果对他人的错误表示冷淡或妥协，不敢进行批评；或者对自己的错误表示宽容，不肯倾听一切不论是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批评，都无异于“关闭了真理之门，使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这种态度，既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学术进步的一大障碍。罗老在这方面的见解和实践，只要我们细读《困学丛书》第十种《记序文存》里他为自己的著作所写的几十篇序文，就可以清楚看到。

学术研究能否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直接关系到学术民主和学术为公的问题。罗老是我国史学界的老前辈，国内外著名的史学家。但在学术面前，他始终把自己摆在和大家平等的位置上，不摆专家架子，不以权威自居。他尊重同志，爱护晚辈，不论是老同志还是年青的同志，只要对他的著作提出意见，他都认真对待，细心思考，发现错误，立即改正。他在著述中得到同志们的提示，或在某些问题上参考了同志们的调查研究成果，不论巨细，都一一注明，十分尊重别人的劳动。有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罗

老原先提出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始于辛亥元年在广西永安州驻军时期。后经安徽一位年青同志提出商榷意见，罗老经过认真考虑，不但表示接受，而且还专函致发表商榷文章的《安徽史学》编辑部，对提意见的同志表示赞许与感谢，并且要求“以我为主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建议本着“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细雨的文笔，提出批评；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批评”。罗老的建议和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为学术研究开展“百家争鸣”树立了榜样，赢得了史学界以至舆论界的一致赞扬。

学术民主和学术为公，说来容易，但要象罗老那样把它付诸行动，还需要有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在罗老看来，“我们只要想到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是要靠大家共同来缔造，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都会有助于研究的深入，那就自然情正而意平，对待不同观点抱‘疑义相与释’的态度互相切磋了”。何况科学研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不产生错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承认错误，服从真理，是一件光明磊落的行动”。在学问的相互切磋中，“气贵于平”，“情贵于正”，大家都应努力做到“文淳意静，不伐不矜”。只有这样，我们的良好学风才能树立，高尚的史德才算具备，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才能得到繁荣和进步。

在《困学丛书》中，罗老还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治学经验，书中的《治学篇》，就是专门谈读书和做学问的。而《记序文存》，把罗老为自己或为同志们的著作所写的几十篇记序文章汇集在一起，不但使我们了解罗老对做人、做学问的许多精辟的见解，还有助于我们了解罗老数十年来在科学研究的崎岖道路上艰苦追求，奋力前进，勇攀高峰的步步足迹。对我们来说，无论是罗老在学术征途中的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值得认真学习和吸取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罗老很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并以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科学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前，罗老从胡适学考据，受过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严格锻炼，虽然也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对于历史上范围较大、情况比较复杂的问题，就往往感到难以解决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罗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一边学理论，一边检查旧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改写旧著作，研究新问题，在实践中逐步树立了学术研究必须对人民负责的思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全面、联系、辩证地观察问题的方法，从而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飞跃的进展。记得在建国初期，北京的学术界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议论：那些学识渊博、功底深厚的老学者，如能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实践，定如猛虎添翼，必能产生大成绩，做出大贡献。我想，罗老正是这样一位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又能不断否定旧我，从而对人民做出大成绩、大贡献的一位大学者。

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历史研究？这是个理论问题，也是我们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对此，罗老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是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历史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应该记住，马克思主义最尊重事实。只要大家都承认并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研究历史，把史实搞清楚，就不应该存在不同的观点。如果对历史事实不加稽考，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弄清事实的真相，就宣布自己有了什么“观点”，或者说自己的“观点”和他人有什么不同。那么，这种所谓“观点”，实际只是脱离历史真实的，个人主观的看法，只能称作主观，而不能称为观点。因为，正确的观点只能产生于对历史事实稽考清楚之后，根据实在的情况得出来的。

基于上述的见解，罗老做学问十分重视对史实和史料的考辨，

数十年如一日，草草矻矻，对我国历史特别是太平天国史的考辨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对史事和史料的怀疑考信，是我国两千年来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可是，无可讳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怎样正确地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从主观需要出发，对史事史料不加稽考清楚就轻易地肯定或否定，做出结论；或者视考辨工作为雕虫小技、细节末流，不愿意艰苦地去做好学术研究的基础工夫等等现象，都是存在的。罗老反对这种不务实际，不负责任的空谈。他告诉我们：“做历史研究工作，必须记住：断断不能不加稽考就轻信，断断不能摸到头髻就是阿妈”；任何史学著作都应该做到“言必有据，无征勿信”。只有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上进行探索，才能得出正确的论断。所以考据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工夫，也可以说是基础的工夫。凡有志于史学研究的同志，应该练好这个基本功，扎扎实实从这个基础做起。

那么，怎样做好史事史料的稽考工作呢？罗老谈考据经验，认为首先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克服孤立，片面地看问题，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历史的本质。第二，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要“在宏观的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在微观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第三，要胆大心细。“胆不大不敢怀疑古人，跳不出人家的圈子。心不细则不能做钩沉索隐的求证工夫”。第四，要慎重地思辨和取舍。科学研究只有经过长期静心的不断钻研和探索，才能分辨出事物的是非、真伪，粗疏急躁是办不好事的。第五，要忠实于科学，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断案要慢慢地下”，“证据不够，要悬而不断”。这就是说，要老老实实的做学问。“只有老实人才配当历史家”。罗老的这句话，是颇为中肯的。当然，办事治学要有成就，还必须具有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的精神。罗老说：他生平没

有一件过期还没完成的工作，没有一件说过而不做的工作，“今天要做的事，决不留到明天；预定的事，一定要把它完成”，否则“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一定要把它完成，除死方休”。现在，罗老已是耄耋之年，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依旧坚持不衰，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令人敬佩！

罗老对史事史料的考释，从假设入手，通过考证解决问题。假设，并不是随心所欲，先定框框，然后围绕自己主观的设想去拼凑证据，而是把假设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然后以大量可信的资料给以证明。罗老对南京堂子街壁画的考证，就是从茫然一片中认真细致地观察，看出：画应有人物而没有人物，画中有与清代及古代形式不同的望楼建筑这两个最显著，可以代表全部壁画的特点，从而提出：那些壁画不绘人物可能是太平天国的制度，望楼建筑可能是太平天国新创的建筑的假设，然后通过大量史料的稽考论证，使问题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罗老在《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的自序中，讲到《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的写作时说：“我做考证，并不是为要证明某一看法而去考证的，而是要考明某一问题的实情究竟是怎样而去考证。所以常有考证得出的结果与当初‘以为是这样’的看法相反的。”

罗老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的自序中，自谦地把自己对太平天国史所做的大量考证辨析工作，比作给读者进一步研究“预备下一块砖、一片瓦的小小工作”，把自己喻为史学研究中的“清道夫”。但谁也不能否认，万丈高楼起于块砖片瓦，没有翔实的史料，不把史事考辨清楚，是建立不了历史科学的大厦的。罗老几十年来对太平天国史认真，严肃、细致的考证辨析，不知为多少人扫清障碍，开拓了通往历史科学殿堂的道路。这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罗老常说，他是个“书呆子”，“终生干的是笔耕工作”。我请同志们在读《困学丛书》的时候，不要放过《记序文存》第一辑的《沪滨

剩稿》。它收集的《冬夜》、《人生》、《怎样集中革命的势力》、《农民运动的紧要》等文章，都是罗老二十年代的作品。在这些“剩稿”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罗老在年青时代就是一位“向往光明，反对黑暗”，歌颂人民，欢呼革命，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建国以后，罗老很快成为共产主义者，绝非偶然。这些年来，罗老由于年事已高，虽然足不出户，但是，他的思想、感情始终是和人民息息相通的；他的一言一行，他的工作，和国家、民族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关心社会进步，他无私地把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验传给年青一代，希望他们“做到后来居上”。

罗老的道德文章，素为大家所敬仰。去年，北京、南京、广西、浙江等地分别开展了庆祝罗老八十五岁寿辰暨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年的活动。史学界许多同志对罗老的崇高品德和丰硕的学术成就做了介绍，我深有同感。承蒙罗老的信任，在《困学丛书》付印之前，给我以先读全稿的机会，并多次来信嘱为《困学丛书》写序。草师之前，学生岂敢？！但把读后的初步感受向老师和读者同志们做个汇报，却是不容推卸的责任。是否有当，还请老师和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钟文典谨序于桂林独秀峰下

注：文中引用罗老的话，皆见《困学丛书》，恕不一一注明。

《困学丛书》自序

我编这部丛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里所收的著作都是小册子，保存不易，所以要辑在一起。又其中《天地会文献录》、《治学篇》、《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八法对笔迹的鉴定》这几种，都是具有应用的性质的，为便于应用起见，也以辑在一起为佳。

另一个原因，是今年广西史学会第五届年会与贵县人民政府要联合举行庆祝我工作六十周年。闻讯辞谢不得。尔纲广西贵县人，不曾为家乡稍尽棉力，耿耿此心，十分惭愧。所以特赶辑这套丛书，作为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献礼，恳请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所得稿费即送交贵县图书馆，以稍赎歉仄。

我这部丛书所以叫做《困学丛书》，是因为我一生治学，都是从不知，经过困难，奋力学习以求知的。我在本丛书《困学文存》内《史林漫拾序》中，谈到我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手迹真伪的故事，说明了我对任何工作，都是经过锲而不舍的难辛追求，才从不知得到知的。我国古人说过“困而知之”的话，所以叫做《困学丛书》。

这部丛书现收十种。将来如条件许可，还有几种同类性质的著作可补加入去。现在这十种，其目如下：

第一种 《天地会文献》

专刊一九三三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发掘地窖所得的天地会文献。这部文献，一九三四年，我把它在《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八卷第四期上刊布。一九四三年，编为专书，并收《守先阁藏天地会文件》，以供比较研究，附录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以供参考，称为《天地会文献》。台湾省学者对《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很重视，认为自十九世纪以来，在东南亚、华南与加拿大相继发现的天地会抄本中，是最早和研究天地会最重要的一本，并据以证实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时间、地点、人物等重大问题。由于这是一部重要的文献，故收入本丛书内，并列为第一种。

第二种 《治学篇》

这部书是广西史学会第五届年会叫我写的。其中除应年会之命撰写的《谈治学》一篇外，并收本征、断案、悬而不断及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经验四篇。

第三种 《李秀成传》

叙述这位英雄的一生，并附《李秀成伪降考》，以见此英雄的真面目。

第四种 《太平天国史考信录》

我研究太平天国史，先考明事实。其长篇考证编为《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已出八集。短篇的考证都收在本书内。

第五种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

此书系我于四十年代为前广西通志馆撰。现据近年研究和

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加以改写。

第六种 《太平天国的游击性运动战》

一九三八年读毛主席《论持久战》得到启发，写成此书。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一九五五年修订重印。

第七种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统计表》

四十年代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时，用该所从故宫博物院整理清代档案清册统计而成，是迄今唯一的清代人口统计表。

第八种 《八法对笔迹的鉴定》

以书家八法理论来鉴定笔迹，是著者于一九五七年因《李秀成自述原稿》真伪问题，从艰苦探索中摸出来的一种鉴定笔迹方法，已取得书法专家的同意，认为可供文物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应用。

第九种 《文史杂考集》

这是一部对文史问题的考证集，解决了文史上的一些问题，和考出了一些历史事实。

第十种 《记序文存》

这是一部记事文和序跋文集。所收记事文都与稽考史事有

关。序跋文都是对学术著作的评价,可见近年学林的情况,其中并有著者阐述自己治学的态度和经验。

以上十种,有的是已出版过,有的还没有出版过。其已出版过的,都从新加以审核,有的还据新研究成果和新发现资料加以重写。自今年三月到现在,为时半年才编改成。兹谨将缘起和经过奉告读者,敬请指教!

我这部丛书,承广西人民出版社惠予出版,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韦纯束主席赐予题字,承钟文典教授审阅并赐序,承广西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刘君达、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饶任坤等同志,大力帮助,均深铭感,特此致谢!

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罗尔纲谨序于北京